

从常州地区会道门的兴衰看地方权力体系之演变

苏阳扬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是近来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文章力图以会道门兴衰为线索, 来考察 1937~1953 年间常州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演变。1937 年以后, 会道门的势力在常州兴起, 主要是因为以商会为代表的绅权势衰, 使得抗战期间地方自治力量缺失。1946 年以后会道门在常州发展到了顶峰, 国民政府试图对会道门加以控制, 但多流于形式, 反映出这一时期国家基层政权薄弱, 尤以国民党基层党治之不足为代表。1953 年, 会道门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销声匿迹, 政府对会道门自下而上的瓦解反映出国共政权更替以后, 国家地方控制力的加强。

关键词:会道门; 常州地区; 地方权力体系; 国家和社会

中图分类号:K207/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08)04-0009-09

1946 年 1 月 12 日, 中华理教总会理事长王有才将“一贯道内幕调查情形”电呈国民政府教育部, 请求查禁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1 月 31 日, 国民政府社会部专员徐霖会同王有才, 将一贯道在南京建邺路 187 号总坛崇华堂、南京三茅宫 99 号明一总坛两处道坛房产一并查封, 交由中华理教会暂行保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抗战结束后积极协助国民政府查处道会门组织的中华理教会,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自身也被划为反动会道门而遭取缔。中华理教总会自 1935 年 5 月在南京正式批准成立以来, 原本主要分散于天津、上海等地的理教公所实现了全国范围的扩张。到 1946 年, 其地位因作为政府取缔汉奸会道门的主要合作者而愈加巩固。但共产党执政以后, 中华理教会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 很快在大陆基本销声匿迹。从一个合法团体(政府的合作者)到反动会道门之一(国家镇压的对象), 中华理教总会在国共政权交替之际经历了命运的转折。在其兴衰的背后, 国家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作为会道门的一员, 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具有代表性。其他组织虽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但命运兴衰都与国家紧密相连。那么问题在于, 国家和会道门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呢? 另一个问题是, 虽然会道门历经取缔,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并没有消失, 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彻底瓦解, 原因何在?

国内有关会道门的研究偏重整体考察而缺乏个案的分析^①, 这样虽利于对会道门全貌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把握, 但忽略了会道门组织在中国广袤地域下存在的多样性。与国内研究相较, 海外学者更加注重个案研究, 同时在对会道门的考察中引入新的视角。日本学者三谷孝(Mitani Takashi)从“传统与革命的遭遇”之视角考察了 1928~1929 年期间, 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刀会暴动。三谷指出苏北的小刀会暴动实际是对民国“党治”向地方渗透的反抗; 而他对 1929 年溧阳大刀会暴动和国民党改组派关系等研究则揭示出, 会道门实际领导着一个与乡村政府分庭抗礼的组织, 在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②。在三谷的基础之上, 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运用其“复线”历史(synchronic)理论^③, 把反宗教运动视为现代化象征掩盖下的一场权力斗争, 其结果是政府权力向地方社会的进一步扩展。近日, 杜赞奇又在其对于以伪满洲国道德会为例的救世社会(redemptive society)^④研究中, 指出这些救世团体所代表的是一种区别于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激进的反传统的、源自于传统和民间文化的现代性模式。他们在话语系统中勾勒出一个属于中国现代社会的稳定不变的文化内核, 即现代性的原真性空间(the space of authenticity in modernity)。上述成果为会道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即从“国家和社会”、“现代与传统”视角之观察。然而以上研究也有待补充, 如三谷的研究在会道门与国家互动之层面上, 偏重暴力性重大事件的考察, 强调了冲突的一面, 但对于日常情况下二者之关系并未涉及; 而杜氏在研究“救世社会”所代表之“传统”时, 所应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日本殖民机构的档案, 由于这些组织处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 这些档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原生状态而不是“王道”、“大东亚”主义影响之下的傀儡文化, 有待进一步考察; 另外, 尚没有针对会道门命运转折之际(即把 1946 到 1953 年作为一个整

体)之研究,上述研究的主体是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

针对上述会道门研究中的问题,本文拟由地方之个案入手,以1937~1953年间苏南常州地区会道门之嬗变为线索,围绕地方社会研究其与国家之关系及互动情况,从而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之下渗情况。常州地区实际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样本。就会道门本身而言,在这一时期内常州境内活动之会道门多达40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就同国家之关系而言,民国时期常州所在之江苏省乃国家统治中心地区,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以后其作为新解放之“国统区”,转而变为国家控制之较为薄弱地区,这种转变对于本文研究会道门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再者,本文力图揭示国家与会道门在“现代”与“传统”话语层面上的争夺,而常州地处江南且富于礼教社会之传统,足以代表纯正之文化传统。

一、绅权势微:会道门兴起与常州地方社会变迁

常州地区可考的会道门活动(仅指得以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初仍然存在的会道门)最早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土生的三茅会^⑤和清嘉庆年间大乘教的传入。太平天国时,乱坛(又称儒教)道首戴全高由苏北来武进设坛。民国年间,1927年同善社在常州设立了一个佛堂,发展道徒135名;1929年先天道由上海传入,发展道徒62人;理教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活动;另有红三教,民国时期城乡道徒不足20人,及信奉“玉皇娘娘手下老龙王”的大王会。不难发现,虽传入时间与会道门总体之缘起相差无几^⑥,然截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常州的会道门活动十分有限。1937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1939年,清静佛教会在常州发展组织;同年冬红相会(即红枪会)在城北门建立第二分会;1940年中教道义会在常州建立武进分会;同年冬中华洪道社(即道德学社)常州分社成立;1941年,一贯道在常州传道,至1947年号称道徒5万;1943年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在常州成立总办事处,道徒1000余名;1948年中国健康促进会开始筹建武进通讯处。从1939年起,有影响的会道门团体,如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理教除外),均在此时期传入并形成气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以后传入的会道门仅只有土改时期苏北逃亡地主来常所建的天仙道。

常州各会道门的传入与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清中期的缘起,第二是民国前期,第三是1937抗战爆发到1948年。通过考察,前两个阶段的会道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办道规模上都无法和第三阶段相比。根据常州地方六次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统计资料计算,常武地区会道门共发展道徒222820人,占总人口的4%^⑦;金坛、溧阳两县各有近万道众。而且这只是会道门经历新中国初年大幅萎缩后的数字,1937~1949年的人数远不止这些,如一贯道在其最盛时期的1947年拥有道众12万人。实际不仅是常州,这一情况在苏南十分普遍,例如江阴县的人数是17794;苏州市则高达3.49万,占全市人口的8%。如果把道众视为会道门所控制之人口,其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那么,会道门在1937年以后勃兴之原因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无疑要考察地方社会之权力体系。如果常州原有的体系没有发生变化而产生权力真空的话,1937年前后会道门的发展不可能判若两端。关于地方社会控制,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学者重田德(Shigeta Atsushi)为代表提出了“乡绅支配论”^⑧,80年代美国学者玛丽·兰钦(Mary B. Rankin)^⑨和罗威廉(William T. Rowe)等(持哈贝马斯之理论)提出了“公共领域”说(public sphere)。前者直接强调了绅权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后者所谓非公非私的第三领域也是由绅董主导的。而日本学者夫马进通过善会善堂史的研究对二者提出置疑,认为国家对于地方社会各项事业影响至深^⑩。实际上述争执在很大层面上是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争执本身证明,对于地方社会权力体系而言,绅权和国家并存,但互有消长。本节不妨先从前者入手,着重考察民国建立后常州地方的绅权情况,而在下一节中注重国家干预的情况。

清末尤其是民元以来近代化成一趋势,常州工商业飞速发展,而地方绅权也随之以新的形式——商会——出现。武进县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而“历届商会领导机构主要由士绅、绅而商者与官府关系较亲密者组成”^⑪。商会创始人恽祖祁(1893~1919)曾任福建兴(兴化府)、泉(泉州府)、永(永春府)等地知府,后因同日人抗争而罢职归里后与常州知府许星壁等发起创建常州府中学堂,同年筹建常州商务分会(武阳商会)^⑫。1911~1921年任会长的钱以振(1878~1943)曾是山东邹平县知事,1936年还任过商团团长;于定一(1876~1932)1915~1923任商会正副会长后,曾任丹徒知事;后恽子恽毓昌(1866~1926)接任会长;商会特别董事、商会会董沈保宜曾任温(温州)、台(台州)道台。从创办一直到1927年,武进商会直接控制在地方绅士手中,而老绅士钱以振直到1937年还控制着商会武装。可见,虽然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然旧绅士群体(尽管可能只是一部分,且大多已经

是“绅而商者”)通过现代团体商会继续其存在。那么,新形式下,绅权之“权”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民国初年作为常州“公共领域”的代表,武进县商会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民政、公益事业、社会治安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为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商会自1905年起着手改善地方水陆交通,辟建自火车站入城的马路,1918年续修的火车站入城后直达城中、城西闹区的马路;同时西门城等地建文在桥、天棺桥(卞桥)、椿庭桥、润之桥、元丰桥、广成桥等;1913年与武进县市董会合作,浚城内前后两河,1917起协助政府设理河局,常年在城区主要河道,为来往船舶排档疏挤,并购置挖泥机船对运河进行切滩挖泥作业。武阳商会期间城内闹市设置前后两个保安局,其目的是一防盗窃,二防火灾。民国以后,商会为了提高保安局的救火效率,在史家弄口前保安局购置了洋龙。1906~1907年,商会领导恽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它至今仍然是常州最好的中学。1904年商会同董于定一等创办非盈利性民办图书馆。商会在1901、1913、1916年分别将市内墓地和忠义祠等辟作“公园”,供民众游览,管理人员和养馆花匠由商会雇用¹³。在商会经营的公共事业中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地方武装的“商团”,1910年创立以后,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乡里为名,规模逐渐扩大,到北伐前“还有几挺轻机关枪,是当地最大的武装力量”¹⁴。这也成为民国初年商会控制地方政务的主要依靠,甚至可以和军阀政府相抗衡。商会在有关捐税问题同军阀的抗争中,曾经两次使军阀作出让步。一次,动用商团与军政分府司令何健的部队武装对峙;另一次则迫使李苑政府撤换省财政厅。1927年大革命时期,商团曾对工人运动鸣枪示威,稳定了局势并组织黄色工会与之相抗衡。

如果说1912~1927年间旧式绅士得益于尚没有一个稳定、强力的国家政权,从而利用商会等现代组织,延续、甚至扩张了其在地方的控制权,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意味着情况的改变。有关国家基层权力的详细情况,本文将在下一节中予以评估。但无疑,北伐军进占常州以后,国家权力也随之对绅权的固有领域进行了渗透;同时大革命时期的工潮和打击土豪劣绅的宣传也动摇了绅权的合法性。1928年6月,在国民党有关决议15的影响下武进商会被改组,并改会董制为委员制,会长改称常务委员。长期操纵商会的绅商代表钱以振、于定一等人均已退出领导层。但旧绅士之影响并没有立刻终结,钱以振仍然是商团团长,而商会主席郭钧辅(盐商)仍然是有功名的。但到了1936年,蒋尉仙接任会长则标志着国民政府对商会的最终控制¹⁶。而就在这一年,曾作为绅权支柱的商团也全部被县政府收编为壮丁预备队。至此,绅权所代表的地方社会自治力量势微,尽管解放后商会也曾在解放军未进城时维持治安(收到中共武进县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密信指令),但也仅是若干店员“戴消防队臂章,手持童子军木棍”而已¹⁷,全无当年同政府军武装对峙的气势了。

再看本节开头所提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民国初年,常州地方有力地控制在以绅商为代表的商会手中,主观上,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地方绅士们不会允许会道门这一类异端组织广泛传播;客观上,商会经营的诸如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能够满足民众的一般需求,会道门的一套宣传策略(下一节中将具体涉及会道门所凭借之“传统”)没有市场,商团也有能力对付各类刀会武装。但1927年以后,下渗的国家权力削弱了地方对于会道门之抗体。如果说之后的几年里南京政府尚能依靠例如“破除迷信运动”之类的措施压抑会道门的膨胀的话,那么当日本人打来时,国民政府的一切地方权力基础都被清除,而地方原有的自治力量则在早先被大大削弱了,权力的真空自然为会道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而日本人似乎又对这些“救世社会”颇感兴趣¹⁸,如此会道门之膨胀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国家控制会道门的努力及其回应:国民政府基层权力评估

1937年以后地方绅权的衰微为会道门在常州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讨论地方权力体系的另一个层面(国家)之前,关于抗战时期常州会道门的兴盛还有一点需要澄清。部分研究倾向于将会道门在这一时期的成功归因于日本人(沦陷时期,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国家的力量)的支持,这是不合适的。中华洪道社1940年建立常州分社以后一度有所发展,然而其在1942年露骨地更名为“大东亚筹备处”以后,“群众了解这是汉奸举办的组织,因此无人参加”¹⁹。无疑日人的支持为会道门提供了便利,但只是外部条件之一。而就会道门自身而言,攫取和化用传统文化与其成功密不可分。最早在常州传播的三茅会、大乘教、大王会等都是与当地民间习俗相结合的产物。

之后, 绅权衰微, 礼教结束了对于传统领域的垄断。而会道门则在教义、名称及日常运作等方面对传统加以利用。除了以往研究较多的扶乩等“迷信”活动, 从教义上看, 尽管各种会道门之间存在区别, 但基本上都是以儒释道三教合一(后也有加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称五教合一者)或是“无生老母, 真空家乡”为根本的。前者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杂糅, 以求更广泛的认同; 后者则更多侧重民间信仰和乡土观念。从名称上看, 一贯道取义“一以贯之”, 出自《论语·里仁》; 在理教, 谓之信徒“在理”, 结合其教义无疑取自程朱理学之传统; 更有甚者, 武进之乩坛直接称“儒教”。各类组织或借以儒释道三教之内容为名(如中教道义会, 观音堂等), 或直接以某种民间信仰的具体形式为名(如红三教、关帝会等), 无不来自传统。再从日常运作来看, 凡大的会道门在常州的传导场所都冠以“善会善堂”之名, 而表面行救济之事。一贯道在常州又名“武进崇慈慈善会”, 行冬赈、放衣等善事; 理教总会在常设有德善堂、慈善堂、百善堂、敬善堂、忠善堂五处善堂, 开办夏令诊所等事业。这都是对明清之际江南地方善堂善会传统之化用。

借用传统之名, 再辅以慈善事业及若干实利, 会道门成功赢得了民众。然而, 这种策略必然同国家所主张的五四激烈的反传统话语相冲突。国民党年轻党员 19 世纪 20 年代末发动的“破除迷信运动”, 就试图消除包括会道门在内的“封建势力”的影响, 但遭遇有组织的激烈反抗(包括刀会暴动), 遭到失败。三谷和杜赞奇的研究表明, 这种失败一方面说明在中国地方“传统势力”的强大, 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地方权力自身的问题有关(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县政府的对立)。

那么 1945 年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1946 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着手“查禁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然而如本文开头所述, 查禁行动是社会部会同中华理教总会进行的, 这表明在一开始国家的诉求就具有不彻底性。因为中华理教总会本身就是会道门之一, 由其接管一贯道之遗产, 某种意义上只是不同会道门之间势力的消长, 而没有触及整个会道门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状况。但无疑这是国家控制会道门的又一次尝试。介于理教总会与国民政府的密切接触, 不妨以其为例考察这一时期国家与会道门的互动情况。

1935 年中华理教总会成立以后, 王有才任理事长。很快王受到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亲自指导, 并于 1937 年携总会印信迁往重庆, 在重庆于社会部领导下在国统区开展道务, 建立同“汉奸会道门”对立之组织。抗战胜利以后, 王又会同社会部查禁反动会道门²¹。从王有才的履历不难发现, 在行动层面, 国民政府控制会道门的基本策略, 即自上而下, 由局部到整体实现控制。国家试图通过控制会长王有才掌握理教会, 战后由其控制的国统区理教会接收“伪理教会”, 甚至希望由理教总会一统“反动会道门”而达到控制全部的目的。中华理教总会在呈送教育部有关查禁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电文云:

“(一贯道)复利用中国无智人民以天道为名, 中庸之道为本, 授与消极思想, 妖言惑众, 使入道者终日沉醉于迷雾之中, 将国家民族之观念弃之九霄云外……以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孔孟大道竟一变而为弓长(即一贯道首张天然)所传之怪道, 是我总理上承历代正统思想, 近采欧美科学文化所手创之三民主义及总裁平生所演绎之力行哲学, 均将无立足之地, 似此邪说倘听其普遍民间, 其祸国害民何堪设想。值此科学昌明, 原子万能之时, 此种桎梏人民思想之邪说, 亟应彻底查禁, 以免为患社会, 腾笑盟邦。”²²

虽然上文出自中华理教总会理事长王有才之口, 但鉴于王有才的特殊身份(此时的王有才除理事长一职外, 已经兼具“党团干事书记”的身份, 受国民政府社会部资助并定期汇报工作), 完全可以将电文内容看作是政府之诉求。上述材料显示, 国家在话语层面上摒弃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主张。在总体上, 国家把自身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描述为“上承正统思想, 下采科学文化”, 这样虽然承认了传统文化的地位, 但前提是把国家塑造为传统的化身。同时, 国家并没有放弃一贯的主张, 即民族、国家、科学等现代性话语。在王有才的电文中, 对一贯道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投靠日人, 背叛国家民族; 二是歪曲传统, 邪说为患社会。前者打着民族主义旗帜, 后者则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与之相似, 另一份电文²³也给一心天道龙华会归纳了五条罪状, 首恶即“不用国历竟用私制之历法”。历法为现代时间观念之重要标志, 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共时性观念则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²⁴, 因此必然引起国家之高度重视。后三条罪名都与勾结日本人有关。最后一点则指出一心天道“自称儒释道三教合一, (实际)非释非道, 尤去儒宗甚远”。这些材料都反映出国家使用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现代性话语对会道门所倚重之“传统”展开攻势。

国家此次对于传统文化所持折衷调和之态度，故未在地方再次引起诸如刀会暴动之激烈对抗。但对于国家的又一次干预，会道门不得不做出回应。理教总会武进分会在常州地区的发展规模仅次于一贯道，会长穆敏泰曾是青帮成员，1943年以后一直担任分会负责人。1946年分会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中华理教总会是社会部在案的“公益团体”○25，但武进分会于1943年开始活动，而常州又属沦陷区，故有“汉奸会道门”之嫌疑。

1946年11月12日上午，武进分会在常州大戏院举行了成立大会，穆敏泰自任武进分会筹备主任，称“城乡理教各公所均已遵照合法组织成立支会”○26，并“要求政府准予给示保护”○27。这样一来，分会摇身变为1946年以后成立之合法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得到了国家的默许○28。除去合法化努力之外，新成立的武进分会实行现代组织形式，人事上采用理监事制，分理事长、理监事、理事；机构上县市分会以下设乡镇支会，设有理监事会。由于1935年理教会就已对外更名为“中华理教总会”，武进分会成立之时予以沿用，免去更改会名之苦。实际为迎合国家的现代性话语，旧式会道门不仅以现代组织形式进行改组而且大多冠以新的名称。如常州一贯道改名为“武进崇慈慈善会”，同善社改名为“中国福善社”，先天道更名为“中华先天佛天总会”，道德学社更名为“中华洪道社常州分社”。更名之共同特点是都在前面加上“中国”（或中华）二字，这是与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相适应的。另外，在武进理教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加入了月报、筹组财经、改进委员会、考绩、选举等新的工作。

然而理教会在国家压力下的上述种种现代化努力似乎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实际操作的仍然是传统的一套。虽然进行了理事长选举，甚至开会讨论理事长的任职期满问题○29，但是直至1953年穆敏泰一直担任会长控制分会。新的组织形式只反映在书面记录中，而实际人员仍然按照旧的体系划分（分领众、四座、承办、挡众等），负责相应的工作，道众仍然互称道亲。日常运作中，面向民众的活动依旧是劝戒烟酒，下令施诊、开斋等旧事，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分会自筹资金，并没有从国家那里得到合法许可之外的任何支持。可以说，对于理教会，国家并没能如愿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地方分会仍然在旧道首的控制下自行其是，新旧两套组织形式并行，前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其他会道门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曾一度被起诉并查禁的一贯道实际也没有消失，反而在1947年达到新的高峰，在常拥有道众12万（1947年常州城区人口仅223861○30）。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控制会道门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仅表现为现代与传统话语争夺上的优势，而流于形式，实际并没有彻底消除会道门势力。国家没有彻底取缔会道门，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力不能及，二是会道门有利用之价值，归根结底还是基层权力体系的问题。如果国家拥有可靠的基层政权，就谈不上无力实际控制会道门，甚至直接取而代之。

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由党政军三套系统组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6年武进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竟然都是会道门成员○31。尽管可能只是名义上的道亲，但足以说明在国家试图控制会道门的同时，后者也对前者的基层部门进行了渗透。关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对于基层权力之重要性，日本学者家近亮子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认为“（如果中国国民党）把党的权力渗透到社会基层的话，国民政府对于中国的统治可能会更加牢固”○32。然而家近亮子对于南京政府十年建设时期（1927~1937）的研究显示，由于“权力内、外矛盾”的制约，国民党基层组织并没有实现预期的作用○33。从常州地方的情况来看，1926年省党部特派员来常，5月2日县党部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年，共发展了70名党员，而作为最基本单位之区分部共15个。1927年党员人数达到1047名。然而“四一二”政变以后，经过改组和资格审查，1928年党员人数降至483名，区分部30个。1930年党员人数仍只有705名，区分部40个，可见共产党被清理以后党务工作远不如前。1937年抗战爆发，党员人数再次锐减至435名，11个区分部。1945年光复以后，党员人数回升至1947人。然而这一时期，党和三青团（1939年成立）之间不必要的竞争严重浪费了党的资源，从而影响其作用的发挥。1945年武进三青团部就县党部在竞选县议员和国民大会代表时发生内讧；三青团还控制《武进正报》和“常青广播电台”同县党部分庭抗礼○34，当时1947年党团合并之后，在1948年党员人数才达到1万人，区分部48个○35。即使如此，党员人数仍然不及会道门人数的零头。而根据家近亮子的研究，内战时期由于过分沉重的工作和资金援助方面的负担，引起大量党员退党○36。

如果仅从控制的人数来看，党部在地方的影响力远不及会道门。那么对于会道门，政府自然难以取缔，且需要借助其势力维持统治。而会道门面对日益下渗的国家权力，也乐于同政府合作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在这一前提之下，1946年以后地方会道门同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关系日益紧密。地方政府大员纷纷参加会道门组织（一贯道），并为其提供保护（一贯道、理教分会等）。而会道门则帮助政府缉查共产党；甚至有的会道门还协助政府收税（三茅会）；1949年共产党军队进城前，武进县长翁伎也是由会道门（一贯

道)护送出城才得以逃脱的。战后,会道门正是通过和国民政府之互动,才得以在规模上发展至顶峰。

三、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与会道门的瓦解:结论与思考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驻常州。城乡分别设常州市和武进县,隶属于苏南行政区常州专区。新政府成立,会道门从中嗅到了不祥的气息。由于1946年以来同国民政府的合作,道首们意识到可能不会见于新生的人民政府。一时间,大部分已经公开活动的会道门转入地下,恢复到其秘密教门的最初状态。一贯道作为常州地区最大的会道门组织,1944年就曾协助中统特务搜捕中共常州地区工作人员,解放前夕又护送政府官员出逃。由于多年来同国民政府的合作,道首们意识到不会见于新生的人民政府,故采取非常措施与政府为敌。道内颁发了“整风须知”,规定单线联系;部分道首买通派出所民警获得迁出证,逃往苏州上海等地开办毛巾厂等掩护事业;一部分人员甚至进入政府内部。同时随机散布各种谣言,如解放军进驻则说“九九八十一劫”将至(解放军使用八一徽章);朝鲜战争爆发则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土改时则说“不义之财不好得,白占地能几时”○37。同善社、一心天道等组织大都采用类似的办法。但并不是所有的会道门都与政府采取直接对抗的态度。理教会武进分会希望通过既有策略来面对新政权,一方面积极向政府申报登记合法团体(被驳回),谋求合法化;另一方面改造自身,如在抗美援朝时订立“爱国公约九条”○38,以迎合新政权。这种合作的态度确实帮助理教躲过了1953年最初的运动○39。

相对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局面并没有多少好转。国内大量匪特有待肃清,而对外还有朝鲜战场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7月起,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把矛头对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在运动前期,从排序上看,会道门问题被置于末位;从常州的情况看,会道门问题表面上并不严重,因而甚至没有公开取缔○40。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能公开取缔说明会道门对于一般民众仍有相当的影响,使得政府有所顾忌。然而,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国内的各种反政府势力被一一肃清;经过土改、农村合作化、三反五反等运动,新政权对于地方的控制也日趋巩固。如果说1949年政府在新解放区仍然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此刻国家已经具备足够的力量对会道门宣战了。1953年2月7日常州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布告,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自此起,全市发起六次取缔会道门运动,共取缔会道门组织40余个,直至1960年将全市范围内的会道门一举铲除。其中1953年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取缔的一贯道等组织占会道门总人数的四分之三。因而不妨以一贯道为例来看会道门问题是如何得到最终解决的。

军管会对于常州地面的会道门采取了有步骤的措施,第一批被取缔的会道门(一贯道、同善社、一心天道、九宫道)都是选择直接与新政权对抗的组织。宣布取缔以后,军管会并没有采取直接行动,而是先在地方报纸上连续五天刊载名为《罪恶滔天的“一贯道”》的文章,分“来历与本质”、“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危害”、“欺骗群众的阴谋诡计”、“大家行动起来”五个部分○41揭批一贯道。但是宣传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许多人表示:“反动会道门祸国殃民,应该坚决取缔,但和我没关系,又何必参加斗争多伤脑筋呢?”“我只管吃饭睡觉,不管嗲老(方言:什么)一贯道两贯道。”而道徒则认为“我入道是为了信神,不是为了‘反动’,因此可以不反动”○42。问题在于运动一开始国家同民众目标不一致。政府仅从政治话语角度强调会道门的“反动”性;而民众对于会道门的认识则更多停留在传统信仰的层面,因而空洞的政治说教无法激起民众的热情。政府很快改变策略,报纸上连续几天登载了《“一贯道”害瞎了白和尚的眼睛》○43,《“一贯道”害死了我得母亲》○44,《“一贯道”勾结汉奸陷害我》○45等一批文章。同时采取了更加生动的宣传方式,如广播大会、展览,电影《一贯害人道》、相声等,每次都有上万人参加。从强调“反动”本质,转而强调与群众切身相关的骗钱害人的罪行。这样一来,会道门所凭借的慈善组织等名义被打破,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从而赢得了舆论。当然,仅仅在话语层面动摇会道门的合法性是不够的。在具体行动上,取缔活动最先在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工会、妇联、居委会等部门的组织下展开。这使得运动一开始就区别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运动最先瓦解的是普通道众。各种宣传向道众灌输了道首骗财害人,“扶乩”迷信骗人等观念,动摇了道众原有的信念。同时,道众受到来自身边的巨大压力,党的基层组织动员了道众的同事、邻里,甚至亲人。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政府在“宽大处理”的政策下设立反动会道门登记处,接受道徒坦白情况,办理退道手续。截至1953年2月28日,共有一万余名道徒交待情况并声明退道。在瓦解了会道门的基础和充分掌握情况之后,政府逮捕了一批道首,并对一部分执行枪决。盛极一时的一贯道至此被彻底消灭,从而标志了会道门在常州地区的彻底灭亡。

会道门从 1937 年的兴起到 1953 年的衰亡,是近代化以来国家权力下渗趋势下,地方社会权力体系变动的切实反映。而国民政府数次控制会道门的失败和新中国政府最初几年里就基本铲除会道门的事实则说明,在对社会的控制上,无疑新政府的基层组织更有效力。正是凭借坚实的基层组织,新中国才得以自下而上地瓦解会道门并取而代之,从而真正掌握地方社会。而国民政府缺乏可靠的基层政权,因此在对会道门的控制中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甚至在社会控制上不得不借助会道门,自然也就谈不上彻底取缔了。

将此问题推广开去,无法有效控制地方社会,意味着实际政治资源的有限掌握,这正是国民党统治脆弱性的具体表现。而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存在质的区别,其发展演化的结果必然是政权的易手。注:本文曾提交于南京大学第九届基础学科论坛,获历史类一等奖。

注释:

①从整体入手研究会道门的代表性著作有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周育民、劭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陆仲伟:《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民国会道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

②具体研究参见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9-255页。

③杜赞奇指出,代表“党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被斥为“迷信”的民间宗教,对“大同”观念的话语解释权展开争夺。前者“借此儒家理想加以融会,使之成为进步的‘历史’目标”,而后者“民众的抵抗似乎又在嘲笑此种利用,因为他们仍然继续将之作为旧式的理想社会的象征”。详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102页。

④杜氏所谓“救世社会”包括道院、红万字会、同善堂、在理教、世界宗教大同会、一贯道等,即本文所说的会道门。研究详情参见 PrasenjitDuaara, “OfAuthenticity andWomen: PersonalNarratives ofMiddle-ClassWomen inModernChina”, inBecoming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ed. Wen-hsim Yeh(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rasenjitDua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EastAsianModern,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

⑤常州的三茅会相传是在唐朝年间于常州小茅山村建三茅菩萨庙开始的,但不足以为据。故以其于清乾隆年间在常州南北门设永宁、永善堂口为发端。此处及下文中有关会道门传入时间和道众人数之具体情况,详见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志》,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9-1100页;江苏省武进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进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3-836页。

⑥会道门的缘起时间大致在明清之际,而以罗教为其开端。参见《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11页。

⑦1953年常州城区人口数为279265。见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⑧重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199-247页。

⑨Mary B.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8。

⑩夫马进通过探讨善堂官营化和善堂经营徭役化为例,指出“乡绅支配论”存在缺陷,而“公共领域”说不合中国国情。详见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书社,1997年,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相关评述参见范金民:《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1 常州市工商联杨树愈整理:《武进县商会大事记要》,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10辑》,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287页。

12 常州市工商联杨树愈整理:《武进县商会会长名录》,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93年,第307-311页。

13 上述有关商会经营公共事业之材料参见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10辑》,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290-302页。

14 万灵:《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个案研究》,茅家琦主编:《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丛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15、19、26 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旧式商会之为买办阶级操纵着,须用适当方法逐渐改造”的决议,万灵著:《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个案研究》,茅家琦主编:《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丛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16 蒋尉仙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次长,抗战胜利后又任行政院驻沪办事处主任。

17 常州市工商联杨树愈整理:《武进县商会大事记要》,《常州文史资料第10辑》,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305页。

18 伪满洲国的例子说明,日本人乐于组织道院、红万字会、世界宗教大同会等团体宣扬其东亚“大同”理想和“王道”观念。参见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19 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志》,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8页。

20 除了传统信仰层面的寄托之外,参加会道门的一些好处也对会众具有吸引力,如理教重要的例行活动斋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道亲聚餐(费用由少数有钱的道众资助,对于大多数道亲是免费的),中国健康促进会武进通信处则声称“进了健康会可以通行全国,乘车乘船可以免费,看戏不要钱,可不抽壮丁”,《常州市志》,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7页。

21 陆仲伟:《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民国会道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3-215页。

22 “社会部内政部为查禁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并组织中国道教会往来函电(1946年1月~1947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18-520页。

23 “天津市政府内政部代电(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七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0-522页。

2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46-57页。

25 《全国性各地重要人民团体一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 1938 年 10 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2-1735。

26 中华理教会武进县分会：《于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在常州大戏院举行[计所会员及各机关代表]本会成立大会》，常州市档案馆藏。

27 中华理教会武进县分会：《简述支会宗旨，要求政府准予给示保护》，常州市档案馆藏。

28 江苏省社会处：《事令以据中华理教会呈请通令各地地理教团体应依法组织一案》，常州市档案馆藏。

29 中华理教总会武进分会：《举行谈话会[更改名称维持分会开支问题，理事长任职期满问题]》，常州市档案馆藏。

30 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14 页。

31 县长孙丹忱，苏南师管区司令周化南，青年军旅长兼城防指挥官张止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盛景馥都加入了一贯道。见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志》，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1092 页。管理会道门的政府机构——武进县政府社会科的负责人高传也参加了一贯道。见武进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进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834 页。

32 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87 页。

33 家近亮子：《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渗透的一个侧面——从党的基层组织来看》，《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86-214 页。

34 盛景馥：《武进县国民党、三青团内部斗争的片断回忆》，武进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进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 年，第 17-21 页。

35 党团合并前，武进三青团的人数约 3 000 人。具体数字(包括前文中的)参见《常州市志》，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153-1212 页。

36 家近亮子：《关于中国国民党党员与党费问题的考察》，《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35-163 页。

37 《常州民报》，1953 年 2 月 10 日。

38 中华理教总会武进县分会：《奉总会令立订爱国公约九条》，常州市档案馆藏。

39 理教分会是在 1954 年第二次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被解散的。

40、19、53 年取缔常州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时，只缴获手枪一支，子弹 39 发。苏南公署公安处长黄赤波的有关报告中说：“对这五个方面敌人的打击是不平衡的。如反动会道门尚未公开取缔。”参见黄赤波：《苏南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苏南行政区 1949~195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第 415-418 页。

41 《常州民报》，1953 年 2 月 9 日-2 月 13 日。

42 《常州民报》，1953年2月13日。

43 《常州民报》，1953年2月17日。

44 《常州民报》，1953年2月18日。

45 《常州民报》，1953年2月20日。

[参考文献]

[1]周育民, 劭雍. 中国帮会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邵雍. 中国会道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蔡少卿. 中国秘密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4]三谷孝. 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5]Wen-hsim Yeh.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7]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 京都: 同朋舍书社, 1997. 伍跃, 杨文信, 张学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9]家近亮子.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M]. 王士花,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0]万灵. 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个案研究[M] // 茅家琦.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丛书.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1]胡成. 礼教下渗与乡村社会的接受和回应——对清中期江南农村地区的观察(1681-1853) [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3(39).